

# 革命到老学习到老的林伯渠

林伯渠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政治家，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他是我党少数几个从20世纪初就从事革命活动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他始终保持革命到老、学习到老的精神，才使他的一生波澜起伏，充满了斗争，充满了意义。

□ 据《学习时报》

## “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

林伯渠出身于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受家庭环境的熏陶，童年时的林伯渠在入学前就已经能够熟背《三字经》《百家姓》等。10岁时林伯渠被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不到两年就已学完了四书五经。而后他跟在父亲身边，学习父亲亲自选编的《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并受到父亲的严加管教。16岁的林伯渠考入西路师范，学习十分用功，两年后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争取到了第一批官费留学的资格，第一次远赴日本留学。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林伯渠积极投身国内的革命活动，并于1913年再次前往日本，进入东京中央大学学习。

在求学期间，林伯渠始终将读书和学习放在首位。关于读书，他认为：“读书以防捻此心，犹服药以消磨此病。病虽未除，常使药力胜则病自衰；心虽未定，常得书味深则心自熟。”而如果真想真正得到学问，要做到两点。第一是“必具毅力”，追求学问一定要奋然前进，不能不求甚解。“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成功者，毅力之结果耳。”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第二是“力去骄惰”。在他看来，骄、惰二字误人最甚，“怠惰如绣，其衰弱身体，速于劳动。”因此他认为不论是学习、用兵还是做人，骄和惰都是万万要避免的。



林伯渠手不释卷，有一点空就学习，有时边吃饭边看书。习仲勋回忆道：“不管是在陕北窑洞里，还是在行军途中，他总是尽可能挤出时间学习，思考和钻研理论问题。”1955年在与临澧县委成员座谈时他曾指出：“要革命就要好好学习，绝不能借口工作忙而忽视学习，不好好学习就要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在他已经70多岁时，他眼睛已经不太好，但仍然坚持每天六点就起床学习至少两个小时；如果不出去检查工作，每天甚至要学习十个小时。

## “智识愈多，愈觉学问不足”

林伯渠深知“智识愈多，愈觉学问不足”，所以他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学习研究各领域知识。在留学期间，他攻读经济学和法学，不仅对财政学和统计学等广泛研究，而且对民法、刑法、国际公法和行政法等也很感兴趣。林伯渠酷爱读书，读书的范围也很广泛，可谓是古今中外样样皆读。在青年时期他广泛阅读各类进步杂志，并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充分思考。无论是儒家、道家等经典著作，还是各类历史名人的著作，他都进行专门的阅读和学习。读书是林伯渠一生的事业，时任富县县委书记的谢怀德回忆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工作期间时曾提到：每次看见他时，他手里总是拿着书，并且常常读书到深夜。

##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陈毅评价林伯渠：“革命一生无愧作，路线正确是英雄。”林伯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思想也正是在读书学习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少年时期，林伯渠由于深受康梁改良思潮的影响，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他在自传中曾写道，正是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中维新立宪学说的影响，加上他本人从日译的欧美书报中了解的有关民主政体的概念，使他加深了对革命思想的认识。但当他读了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后，思想就与改良主义完全决裂。在求学时期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影响后，他决心立志为振兴中华民族干一番事业，并开始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林伯渠不惜抛弃名誉和地位，作出了义无反顾的政治抉择，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走在一起。他在自传中评价自己：“回忆过去，自己庆幸着此生并未虚度，生活

充满了斗争，也充满了意义，瞻望将来，自己怀着从来没有过的信心与勇气，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前进。”他的一生，是在不断的学习中最终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坚定这一立场观点方法后不断学习和巩固。他为自己所写的《六十自寿》中“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这两句诗，深刻揭示了使他坚持走过漫长革命道路的力量。同时，他还深刻认识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光辉的表现”。在他60岁诞辰前夕，还曾向毛泽东请教：“像我这样的人应当如何学习”“如何为党多做工作”。这表明他已经牢牢地将自己的命运与党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刻保持革命和学习的精神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永远保持学习和前进的精神，以及坚定的政治信仰，成就了他革命的一生。

## 赵丹改名

人民艺术家赵丹原名赵凤翱，他从小就特别喜欢演戏，六七岁的时候，他就抹上母亲的鸭蛋粉，扮诸葛亮，演《空城计》。为了分散儿子学戏的精力，爸爸教他学拳术、练书画，但最终没能把赵丹从学戏的路子上拉回来。

进入中学后，赵丹背着父亲，与同学朱镜明、钱骏等组织“小小剧社”，利用课余时间演出歌舞和文明戏。小演员们精彩的表演，让“小小剧社”一时爆红，请他们去演戏的人越来越多。

赵丹16岁那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但他最大的兴趣还是演戏。在上海美专建校20周年庆典上，他组织了几个同学，演出了一场针对美专“绘画是超人生的”“要为创造神圣的艺术而奋斗”等艺术观的对台戏，把美专校长和一批教授得罪了。

赵丹听到校长要开除他的消息后，自己离开了美专，将名字“赵凤翱”改为“赵丹”，考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几年后，当年一起组织“小小剧社”的朱镜明、钱骏跑到上海来找他。见面后，朱镜明问他为何改名“赵丹”。赵丹说：“红色，丹也。我喜欢红色，你们没看到我最爱穿红衣服吗？”朱镜明点头说：“是的，你的大衣里子都是红的。”赵丹进一步说：“这还在其次。你们忘记‘小小剧社’当年曾经受到‘左联’的支持和指导，我们演的戏都是为工农大众发声的。红色代表进步，这是我改名‘赵丹’的主要原因。”

朱镜明、钱骏都夸赵丹这名字改得好，请赵丹帮他们也把名字改一下。三个人凑在一起，思考了半天，最后，朱镜明改名“朱今明”，意思是从今天起要做明白人；骏是千里马，钱骏就改名“钱千里”。

□ 陈扬桂 据《人民政协报》

## 最早为京张铁路 照相的人

在原铁道部科技馆和北京铁路局科技档案馆里，各珍藏着两本厚厚的相册，其红绒布的封面上镶嵌着“京张路工摄影上、下卷”的铜版金字，内中有百余年前由“上海同生照相馆制作”的大小照片共183张。人们在赞叹那精湛的摄影技术之余，无不想知道：这些没有署名的作品，究竟出自谁人之手？

原来，当年为京张铁路摄影的人姓任，名友梅，广东南海人。说来有趣，他跟修筑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不仅是同乡，而且还是儿女亲家。当初有同僚善意提示，用人是否该当避嫌；詹天佑坦然作答：我相中的是他的技术，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倘若谁人能够举荐更有能耐的，我立马将其辞掉！

凭着一手高超的照相技术，任友梅担当了京张铁路的随行摄影师，铁路修到哪里，他就照到哪里，从工地到工棚，从人物到风光，从隧道到拱桥，从站房到火车，从动工仪式到通车剪彩，内容广泛，几乎无所不包。

任友梅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当时也为自己挣下了一笔钱。用这笔钱，他在张家口市内的“高安里”建了一处四合院住宅，又在怡安街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开设了“华真照相馆”，自任掌柜。这家该市最早的照相馆，除备有室内使用的照相机，还有一架便于移动、能拍多人合影、长为80英寸宽4英寸照片的转动相机；1927年，察哈尔省（1912年建省，1952年撤销）政府首任主席赵戴文就职时的集体合影，就是“点名”请“华真”去拍照的。

后来，任友梅过世，子女并未继承旧业；由于家境衰落，照相馆便不复存在了。

□ 杜浙泉 据《人民政协报》